

姜自力 编著

中國史志

之新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史志乾坤大 静坐收获丰

——序《中国史志之最》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吴忠礼
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承蒙自力同志为其近作《中国史志之最》一书作序的雅嘱,同时也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喜悦。作为地方志同人,我为作者十年来默默耕耘获此丰硕成果而高兴,亦为我区史志界又添佳作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中国史志之最》以探源述流的方式力求较全面、系统地把我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此乃不失为很有意义的尝试。读了书稿,产生出两点感想:其一,它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深入展开而出现的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旧史志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究与总结。由此可以预知,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不仅营造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方志文化长廊,而且必将掀起了一个史志研究的高潮。《中国史志之最》恰好恰逢其时,燕鸣报春,我相信史志界光辉明媚的春天已经来临。其二,作者在辛勤笔耕和繁忙的编务工作中,很注重刻苦钻研和理论探索,不仅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编修志书,同时又不断总结修志经验。所以说,该书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十万修志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创作实绩。由此,我向各位读者朋友郑重推荐这本书。

IV 14/26

纵观全书,这部 20 多万字的论著,着眼于疏浚地方志发展的源流,力图给史志的发展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在《绪论》中,作者总述自己的方志史观,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地方志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典籍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全貌。作者认为地方志的产生与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催生分不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异性和自足性决定了地方志这种典籍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和承续。在论及地方志自身发展规律时,作者指出研究方志的产生与发展不能抛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在对比了古今对方志功用的不同理解后,作者认为方志的功用当概括为:政治功能、科学价值和教育作用三点,这可以说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方志所要继承和发扬的三大功用。史与志的关系是历来研究上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作者没有回避这一焦点,而是认真阐述了史志相伴而生、相辅而行的历史发展况貌,立论清晰,见由己出。《绪论》作为全书的首篇,思维缜密,立论慎独,考据精严,一些观点还颇有新意和独道见解。全书分为六大部分。《繁星争辉》一章中,作者将史志典籍比作天空繁星,概述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作为方志渊博第三国的中国,地方志产生发展和传播的情况。现存总数 8264 种、12 万卷,占我国全部文化典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以其数量之巨,传播之广,成为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而彪炳千古。《源头漫溯》一章,集中笔墨追溯方志的起源,论述方志由雏形走向成形的漫长历程,以及方志名称几经变易而终定名为“志”,定位于浩瀚史志之林的漫漫进程。《千秋史笔》一章是一组读史札记,所述都是几部对地方志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史学著作,通过对这些史学著作的重新阅读,找出史对方志的影响,并对于印证章学诚老所谓“志者,史之流也”和史志一家的看法

当不可缺少。《长河浪花》一章可视为一组人物传记，这里主要收录了一批为中国地方志的编写和理论研究做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他们上至皇帝、皇子，下至穷儒、乡老，有誉满天下的学者名流，亦有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平民，他们因对地方志的发展有过首创之功而被历史铭记。作者在记叙这些史志界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时，笔中饱醺了感情，比如文中写到修志最多的人杨笃为方志事业忘我工作，引抄了杨笃的几段日记，读来字字血泪、句句甘苦，思之令人落泪。《百川汇流》一章中分门别类地列出各类堪称第一的地方志书。它们中有第一部全国水道志《水经》，第一部民族志《蛮书》，编印时间最长的志书《光福志》等等，正是由于汇聚了这无数道涓涓的细流，方志才走向今天的洋洋大观。《瀚海春秋》一章着力从朝代的更迭上粗线条地描述地方志历经三个阶段、四个高潮的发展轨迹，不受所谓盛世修志说的拘囿，应用辩证史观还原历史的原貌，比如经过精密的考查，作者认为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是清代，年均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则是民国时期，并论述了这两代之所以会出现地方志的短暂繁荣的原因，史料确凿，论证严密，令人信服。最后作者满怀激情描绘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撰修盛况，认为本届修志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历尽沧桑后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起点，呼吁全国的修志同仁们为谱写新时代最辉煌壮丽的篇章而努力奋斗。

纵观全书，可以见到作者在选题取材上的苦心孤诣，此书虽以辑录“之最”和“第一”的方式来编写，但所叙内容不受题目掣肘，能由一事一人引出与之相关的彼事彼人。篇章在形式上是独立的，而在内容上却互相参照，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网络结构，这种编排方式既便于进行单个项目的内容查找，又能

在阅完全书后对史志的发展全貌有一个完整明晰的线索。比如在论述第一部以“志”为名的志书《华阳国志》时，并不仅仅是介绍该书的成书情况，而是宕开笔墨，由“方志”一词的起源说起，娓娓道来营构出浓浓的历史氛围。在《第一部设大事记的志书》中，作者先是为“大事记”下定义，然后概述“大事记”的功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然后才谈到首设大事记的《刻录》。这样的研究方法既避免了长篇大论罗列史纲的枯燥空洞，又弥补了由现象至现象的简单的材料堆砌。这里既有可靠的史料考证，又有新颖独到的见解，是一本难得的集资料性、著述性和理论探讨为一体的新型编著成果。

自力同志以工作认真，为人诚恳而深得同事与领导的好评。认识他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坐功”，不管世风如何变化，他澄怀书案，多年来默默笔耕，不计荣辱名利，用十年的心血终于绽开这一束志苑的奇葩；对此我喜悦之外更有沉重。想到这些从事方志编研工作的人，在工作任务重，经费紧张，待遇偏低的境况中，仍能矢志不移，孜孜以求全身心地投入到纂修与研究中，着实令人感佩不已。

史志的研究永无止境，许多的研究空白有待今人填补，空间越大，驰骋的自由度也就越大，该书只是这广阔领域中的一个可喜收获，相信古史志资料不断整理发现中，一些新的“第一”和“之最”终将取而代之。一个人占有的资料再多也不可能穷尽历史的真相，资料的疏漏和转抄的错误在所难免，有的考证还缺乏丰富的史料，编排布局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望作者能不辍研究，为史志界再谱新篇。

1995. 11. 3

目 录

绪论.....	(1)
---------	-----

繁星争辉

方志渊博第一国	(17)
修志最多的省	(24)
修府志最多的府	(29)
修县志最多的县	(33)
修镇志最多的镇	(38)

源头漫溯

最早的志书	(43)
第一部以“记”为名的志书	(49)
第一部以“图经”为名的志书	(52)
第一部以“录”为名的志书	(58)
第一部以“志”为名的志书	(61)
第一部以“乘”为名的志书	(65)

千秋史笔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71)
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7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78)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84)
第一部为妇女列传的史书	(89)
第一部史学论著	(93)
第一部记叙典章制度的通史	(100)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104)

长河浪花

第一个为家乡修志的皇帝	(111)
第一个修志的皇子	(115)
第一个修志的宰相	(118)
第一个修志世家	(124)
第一个修志的巡抚	(128)
修志最多的人	(133)
第一个提出在州县设志科的人	(139)
第一个提出“方志学”的人	(146)

百川汇流

第一部全国水道志	(153)
第一部全国地理总志	(157)
第一部城市志	(161)
第一部民族志	(166)
第一部设大事记的志书	(169)
字数最少的县志	(173)
编印时间最长的志书	(178)
台湾的第一部府志	(182)

西藏的第一部志书·····	(188)
---------------	-------

翰海春秋

第一部全国总志·····	(195)
最早的国家修史机构·····	(198)
最早的国家修志机构·····	(202)
编纂图经最多的朝代·····	(204)
方志体例定型的朝代·····	(210)
第一部全国统志·····	(217)
第一部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	(223)
编纂统志总志最多的朝代·····	(234)
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	(244)
方志理论成熟的朝代·····	(251)
年均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	(256)
现代方志出现的朝代·····	(268)
史无前例的修志盛况·····	(274)
十年甘苦始到今·····	(286)

绪 论

有这样一种文化典籍，在曾经战火纷飞、天灾频频的文明国度里，它不仅没有化为历史的尘埃，相反从诞生之日起，其编纂修订工作一直前后相续，代代不辍，绵延 2500 多年，终于富集而成如今这座巨大的文明矿脉。

有这样一种文化典籍，它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其内容的广泛性和记载的多样性，其它任何一种典籍都难望其项背。

有这样一种文化典籍，它的作者上至皇帝宰相、豪门大吏，下至穷儒布衣、乡贤郡望，他们广征博引，皓首穷经，在典籍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并因此被历史所铭记。

有这样一种文化典籍，承载着历史的衰与荣，千年而下旁汇博收，终于汇聚成浩浩荡荡的长河一道走向了今天。这浩然一脉的传统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被重新续起，十万余人员投入到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来，新的辉煌篇章正在谱写中。

这就是方志，中国独有的方志。

顾名思义，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方志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全国目前保存的各种方志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在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这段漫长历史过程中，方志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

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树上的一枝炫烂奇葩,方志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巨大母体的催生和滋养。

中国作为一个孤悬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其自然与人文环境都表现出自足的封闭状态,具有一种内在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又为方志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我国长达 2500 年的方志发展史中,产生了多少方志暂不去论,仅现存的就有 8264 种、12 万卷之多,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很难想象,在文明断续,缺乏文化亲和力与维系力的西方,会出现如此延绵千年的壮丽文化图景。

方志的发展离不开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客体角度讲,尽管对方志的起源有“地理说”、“历史说”、“史地合一说”等多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方志发端于封建秩序建立以后,本质上维护的是一种上尊下卑的等级和以血亲家族为纽带的稳固体系,这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观念暗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文化的经世致用功能和学者的入世精神,强调“和”与“大一统”,这些自然在方志理论和实践中有所渗透与体现,我国方志由最初的记地发展到记人,到西汉人地并存,宋代人地合一,这一变化脉络与我国传统道德、伦理纲常的运行轨迹完全耦合;另外,如章学诚所言:“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方志由编修家谱发展到编修全国统志,反映对象由家庭到村落到氏族到国家,这种递迁也恰好

体现出以家族为圆心的封建纲常和礼教观念的辐射与深入。

从主体角度讲,方志学者们大多秉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视方志为达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一种途径与媒介。史志界一直有“得志修志”和“不得志修志”两种说法,这看似矛盾,其实正好反映出修志者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寄托于修志之中,把修志书作为穷途末路时修身养性,飞黄腾达后彪炳千秋的一种必然选择。同时,受儒家文化薰染的方志学者们,本身也很难跳出儒家传统的循环历史观的思维拘囿:“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存古而信今”等等,史志的资政功能为历来方志学者所重视。主体对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和对史志现实功用的认同,成为促进方志发展的又一动力。

(二)

与其它学科一样,方志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方志是最具时代特色的一种著作,“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方志亦不例外,在受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气等影响和制约的同时,方志又反过来作用和服务于对方。按一般的说法,方志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四个高潮,第一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地记的兴盛,第二个阶段是隋唐图经的繁荣,第三个阶段是宋以后方志体例趋于完备,方志理论与实践进入成熟发展期。前两个阶段掀起两次高潮,后两个高潮则发生在明、清两个朝代。

从第一个阶段说起,地记的兴起与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

和士族势力的日渐滋蔓密切相关。据《中国古方志考》著录作粗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有 176 种,占同期各类志书总和的一半以上。现知秦汉的地记不超过 10 种,隋唐以后的地记也不多,唯独魏晋南北朝这段时期地记最发达。在这个阶段,封建门阀制度得到巩固和加强,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实力空前膨胀,这些构成了地记得以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当时的士族为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与特权,维护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自然要寻找为其制造舆论的工具。他们为了夸耀本家本族人才的出众,标榜自己门第的高上和郡望的优越,便着人编纂以彰扬本地贤杰和宣传当地地理条件优越为鹄的地记,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因而,融地方性传记著作和地方性地理著作于一体的地记,本质上讲,则是当时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地记盛极一时,也与当时民族大迁徙,以及侨置州郡、整顿版籍的推动不无关系。而且,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交战双方出于战事的考虑大肆搜罗方志,客观上也促进了地记的发展。

隋唐图经的兴起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有了明显的加强,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逐步削弱。加之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消除东晋以来侨置州郡所造成的版图混乱、户籍不实的状况,大力整饬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的控制。于是,为适应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便于统治者了解全国郡邑分布、山川形势、整顿疆域版图,强化户籍管理,地记这种割地而记的方志形成便被图经取而代之。唐宪宗时的宰相李吉甫对此也有论述,他认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元和郡县图志》序)。

方志发展到宋代进入第三个阶段。宋代以前,方志之书多

是图经、地记，记地、记人、记物之作各为专书，到了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宋代正是方志从广义走向狭义的承前启后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志书体例基本定型。由于上层统治者和方志学者对史志的实用价值和资政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加之文官执朝，学术气氛较以往空前活跃，所以宋代方志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可喜的收获。南宋学者朱熹出任南康军，刚一到任便查看图经，他要从图经中了解政绩、民俗、先哲、古迹等，当他发现图经不理想时，还亲自动手为之编纂。宋代讲学风气盛行，各地书院林立，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讨论，而学派又都很重视研究学术渊源的师承关系，于是写传记，作年谱，成为当时学者非常重视的课题。

经过宋元两代，作为地方性综合著作的方志，从内容到体例均已大体定型，到明代则有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形成方志史上第三次高潮。明代方志编修产生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流传至今的则不太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粗略统计，今存历代方志尚有 942 种，其中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志。若将这些统计在内，将大大超过千种以上。经过元末农民起义的冲击，明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统治者出于宣扬大一统之盛，教育其子孙牢记祖宗创业艰辛的考虑，自上而下，三令五申推动修志工作，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颁诏修纂《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寰宇通衢书》，到明成祖下谕修一部“貽谋子孙，嘉惠天下后世”的全国总志，因“龙驭上宾”，书未编成，到明英宗诏修《大明一统志》，全国性的编修《大明一统志》的活动，对修志事业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明代因纂修全国总志、统志的需

要,两次编订《纂修志书凡例》命儒臣分赴各布政司催促纂修通志,进呈备采摭,各地还设局修志。朝廷对地方修志,不仅一般号召,而且派专人到各地督促,甚至直接帮助纂修。加之明朝经济发展比较显著,手工业和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商品经济活跃,许多经济发达地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于是,各种乡镇志、专业志也得以应运而生,这也是明代方志得以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的方志编修,到清代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时,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以及如何编纂,许多学者还从理论上进行了论争和阐述,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而使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问——方志学。清朝统一局面出现以后,政治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发展,同样也带来文化上的繁荣,这为方志的大量编修创造了条件,加之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的编修特别重视,为了编修一统志的需要,曾五次三番下令各地要按时纂修各类方志进呈。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编修方志在全国蔚然成风。特别是乾嘉时期,甚至形成举国上下编修方志的高潮。清朝方志编修发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清朝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下,学者们既不能私家修史,又不能描绘现实,于是许多人就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于编修方志方面,况且又是当局所提倡,不会发生大的风险。学者修志,使志书在体例上、书法上更具法度,在记载内容上也更注意其实用价值。总之,由于清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学者的大力推动,方志的理论和实践在清朝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所瞩目。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载,现存清代方志有4889种,约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的60%以上,

其中康熙、乾隆年间就有 1354 种和 1079 种。

(三)

在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同时,方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亦产生积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方志的功用上。而方志的实用性,也是方志历代不衰的最主要的原因。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说:“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方志除了在体例、形式上不断自我革新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其固有的特性和自身的价值取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占据应有的地位,并走出一条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历史道路。可以说,统治者和方志编纂对方志功能的逐渐重视和方志内容上实用性的逐渐强化,贯穿于整个方志的发展长河之中。方志的功用,亦即它的地位和价值,是其它任何文化典籍所不可替代的。

古人将方志的功能归纳为 10 点: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周知利害,以立一代纲纪;详审山川,以决功守之略;备载方物,以筹国计民生;登列丁亩,以定一方赋税;博采风情,以利田地制宜;考核典章,以知政治兴坏;著录政绩,以察官吏贤否;彰善瘅恶,以裨社会风教;广征诗文,以见文化升降(史继忠《方志浅谈》)。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谈到自己写书的目的,引用荀悦在《汉纪序》里提出的“立典有五志”主张,曰:“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还有人则将方志的功用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补国史”四点。以笔者愚见,方志的功用可以从政治功能、科学价值和弘扬爱国主义三方面加以阐释。

在我国川流不息的文化长河中，像方志这样由国家政府诏令天下编修，而且又是有组织、有计划地，朝代相袭，延绵不断，在其它文化门类实属罕见。由于封建政府及各级官吏的直接介入，地方志始终沿着突出政治、特别是注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轨迹向前行进。因此，方志的功能首先表现为政治功能。对志书的政治功用，古今学者多有论述。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于乃仁在《方志学略述》中谈到：“（志书）备行政官吏之省览，俾发政施令得其宜也。——夫行政必娴民情，古今之所同然。方志为一方总览，又时时增修，其征信之程度，自较它书为高，抑且无它书可以代替。昔韩退之（指韩愈——作者注）过岭，先借韶州图经；朱子（指朱熹——作者注）知南康军，下车即以郡志为问；轺轩（指皇帝的使臣——作者注）所至郡县循环事，亦以地志进；职是故也。”这说的是志书的资政之用。章学诚在《答甄秀才第一书》中曰：“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犯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这里讲的是志书教化之功。总而言之，“表忠孝，显节义，扬先贤，倡后哲”，褒奖并劝导人们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强化人们的大一统观念，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并为执政者决策提供信息和依据，这是千年来志书负载的最主要的功能。

方志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存史”和“补国史”两方面。瞿兑之将其详列为6点：“各地社会、制度、种族分合之隐微蜕变不见于正史及它书者，往往于方志中见之。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亦每见于方志。二也。遗文佚事，散见杂书或集部中者，赖方志方能以地为纲而有所统摄。三也。地方经

济状况,如工商业物产等,方志多有纪述。四也。建置废兴,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古迹金石可以补正史及文学之遗憾。六也”。方志多采用原始材料,内容翔实,包罗万象,不仅可补正史之不足,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顾炎武参阅了1000多部方志著作,最终写成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自谓所取资料,正史而外,端资方志。”美国农林科学家施永格从20年代起,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桔、广桔的生长规律,取得了显著成绩。美国陆军部40年代为侵略中国的需要,设专组绘制《中国地图》,方志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尽管方志从根本上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辅治之书”,但客观上,由于它反映了祖国山河之秀美,文化之博大,使人睹之顿生思家乡爱社稷之豪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卷帙浩繁洋洋12万余卷的古方志,将是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理想、最广阔的园地。恩格斯说:“爱家乡是爱祖国的基础。”梁启超在《方志学》中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尔之从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尤其是到了清光绪后期,大批乡土志涌现,仅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6年时间,全国就修成乡土志450余种,平均每年75种以上。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以乡土志做小学堂教材,即便利教学,又能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的教育。王永汇在《辽阳乡土志序》中论述其重大意义:“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澜语也。夫先人堂构虽艰,窅